

【文化杂谈】

网络时代该怎样学国学

□徐宏力

《周礼·春官乐师》中最早出现了“国学”一词,意指学校。当时“学在官府”,国学指国办学校,与现在的公立教育机构有区别,只为贵族子弟服务,没老百姓什么事儿。

国学作为一种学问,最权威的定义是胡适先生在《国学季刊》发刊词中的简洁说法:国学即“国故学”。他只认传统,有大题小做之嫌。我们以为,国学三分:广义、中义、狭义。广义国学即季羨林先生所说的“大文化”,涵盖本土诸族群,少数民族各有族源,有些也以黄帝为始祖;中义国学特指汉族文化学术,延伸进了现代;狭义国学限定在汉文化遗产中。胡适之说当属窄派。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旋律是批判,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旋律是重建。大概从2004年开始,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:民间读经,官祭圣人,孔子学院海外挂牌,季羨林等人发表《甲申文化宣言》……经典回暖,有了复苏温度。尊重先祖说明了现代人的心态变化——民族主体意识在崛起。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进入了全球前列,必须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才行。经济倒逼着文化,国势推高了国学。经过激烈自责与深入自省,我们开始走向平和的自觉与谦卑的自信。

郭沫若先生所言甚善——要在“事上磨炼”。国学是实学,踏石留印,抓铁有痕,建设国家与国人的软实力智库,推动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的现代化。我们不但要向先人学习,也要向自己的实践学习,开发本体智力与心力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事业前无古人,已经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文明,更该

打造灿烂的精神文明,每逢盛世都会在文化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精彩遗迹,当代也不例外。

孔子第79代嫡长孙孔垂长,虽然继承了奉祀官的位子,却没有老派衍圣公的模样。西装革履的他与精通古学的前辈不同,成长过程另有情节,高中毕业后到澳大利亚学习市场营销,后来进入商界。他认为学儒应顺其自然,融入生活。如果他能如此行事,在市场经济中弘扬祖训,修炼为新儒商典范,也有大功德。事实上,当年的子贡就是孔丘的“大款”学生。时代召唤现代子贡,写字楼里需要中国气派。

现代国学是通学,不是专学,需要通才,追求通观价值。相比于西方强调分析的学术习惯,中国学术强调综合,容易形成大格局。季羨林先生认为,国学中

包含着被融入的外来文化。国门一旦打开,国学之门洞开,不是你不想接受的问题,而是你不能拒绝的问题。

那日得闲,看三个学生打篮球。四位美国留学生忽至,商定半场对抗。接着,那四个小老外就比试远投,淘汰了准头最差者。下来的那位很沮丧,只好当观众了。赛后我问中国学生,如果你们是四个人,用什么办法确定队员?其中一人说:我看衣服,让他们上。表情很大度。竞争与礼让都没错儿。美国人喜欢较量,“打球要有侵略性”,这在他们教练的嘴里不是贬义词。牛仔精神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本能,我们不必总用和谐理念批评他们。对话很好,对抗也挺好,在与他们死扛到底中学习竞争,可以提高中国文化的硬度。

网络时代不需要穿长袍马



褂的国学,要想被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所接受,此刻,在场,即时……我们要常用这些关键词提醒自己。历史是逻辑的展开,“史”是“论”的资料,要想讲好中国故事,就要做好现代功课。时代依据现实而非历史做出选择,只知道从哪里来,不知道如今在哪里,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孔子如果活到今天,也不会像两千五百多年前那样讲话,不但要使用现代汉语,还要生成现代思想,正像他使用当时的语言生成了当时的思想一样。孔丘是睿智生动的人,不然当年怎么会受到那么多青年学子的追捧?

《二十四孝》中有个故事。话说晋朝郭巨原本家境殷实,父亲死后,他把家产分给了两个兄弟,独自供养母亲。后来妻生一子,郭巨发现,为了养儿,不能很好地侍奉老娘,就和妻子商量,儿子可以再有,母亲死了不能复活,应该埋掉儿子以便全身心地供养长辈。两口子意见统一后,郭巨就去挖坑,结果地下出现了一坛子黄金,上书“天赐郭巨,官不得取,民不可夺”。老天爷为其孝道所感动,出资帮他渡过难关。这故事若讲在当代,年轻人绝对无法接受,他们认为郭巨是杀人未遂的主犯,他老婆是从犯,如果挖不到黄金,那可伶的婴儿就完了,这是违反人性的反面教材,干吗要宣传郭巨夫妻的愚孝呢?这一题材的画面曾经出现在某地宣传墙上,在反对声中,很快被涂掉了,浪费了油漆。

所以说,越是喜欢国学,越要加以辨别,不能错把封建垃圾当营养大餐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)

【名家背影】

我们家的诗歌研讨会

——追忆父亲孔孚

□孔德铮

在我的记忆中,我们家最早在诗刊上发表诗的是我哥。去年才看到父亲早在1957年发表在诗刊上的《雷声已经隐去》,可惜当年我不知道。当我哥诗才大展时,父亲的“右派”帽子还没摘,每天躲在阴暗的小屋里用臭墨写漫天皆白,搞得满屋臭气熏天。

我哥有新作寄来时,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。“招手太阳借个火,南天门上抽袋烟”,“地头烟里指山川,笑谈丰收不靠天,倘若天河遭了旱,咱开闸灌它个拔浪翻”。不知为啥,父亲当着我,直夸我哥写得不好,可对着我哥,又只挑哪里写得不好。搞得我哥不服气。那时我是我哥的粉丝,我俩背后里叨咕:“净挑毛病,有本事你写出来发表给我们看看。”到父亲在诗刊发表了《母与子》《青岛夏日印象》《雨后》等诗作后,我俩才对父亲刮目相看。

自从父亲写诗以后,谈诗、改诗成了我们家日常生活的重要话题。父亲写诗的习惯是,写作冲动来临时,关起他的卧室兼书房门好几天,只有我妈可以进他屋里添茶送饭。有时我妈拿出一摞诗稿,由我们娘俩分出上、中、下几等。直到这一个单元写完了,父亲才开门和我们交流,问我和我妈为什么这样分。起初我们只能凭直觉,说认为好的是感到新鲜,认为差的是有的地方雷同。这时父亲就打开话匣子,给我们讲什么是诗、什么是好诗、什么不是诗。天长日久,慢慢地我也就了解了点皮毛。每当节假日我哥回来,诗歌研讨会正式开始,有时能争论到黎明。多数情况是我和我哥一伙,同父亲争,我妈折中,弟弟妹妹为我们买菜做饭,也时常乱站队伍帮腔助兴。

“竖一个绿耳/听风雨跳珠”,父亲要改成“听风听雨”。

“佛头/青了//一顾的智慧/生出芽儿了吧”,父亲要把后两句砍掉,只留“佛头/青了”。疼得我和我哥哇哇叫,白雨跳珠,智慧生芽,多么新鲜生动的意象,



好多读者都喜欢啊!这样改会失去很多读者的!本来你的读者就不多,干吗非要逼自己走上绝境?我妈也站在我们这边。孙静轩叔叔干脆棒喝:这样写缺少了蓬勃的生气、活跃的思绪、激越的感情,你求隐求减过了头!

父亲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进去的,他也做了慎重的思考。最后坚决地对我说:“我不能为了照顾读者的数量而停止探索的步伐,坚信将来读者的创造力会超越作者。不论成功失败,我都得往前走。”当时我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,他让我学点哲学、读点老庄。我生吞活剥地看,还是不懂。

1994年因父亲病重,没法到苏州鼋头渚公园参加海峡两岸哲学、历史学界名流专家们召开的《魏晋玄学研讨会》,让我带录音机旁听会议,回来放给父亲听。会议其中一个重大议题是“有”“无”之辩。一天的时间听专家学者们讲老子怎么说,庄子怎么说,魏晋七贤们怎么怎么说,听到我头大,也没有辩论明白到底“有”和“无”谁先谁后,谁轻谁重。晚宴上,我作为会务人员,在顶级专家桌辛冠杰伯伯身边服务。因酒桌上继续辩论,我实在忍不住了,就说,我听父

亲举过两个例子阐明有无关系:咱桌上这个碗,碗的外壳是“有”,形成可盛食物的空间是“无”。有这个碗,是为了用这个空间,因所以说“用无”。咱这个房子是“有”,房间里的活动空间是“无”,咱用的是空间这个“无”。没有房子这个有形的东西,就出不来空间这个无形的,它俩相辅相成,没法分先有谁后有谁,也没法论到底“有”重要还是“无”重要。几句话后,众人无语,纷纷问我父亲是谁,辛冠杰伯伯为我父亲做开了广告。我知道班门弄斧,怕说多露怯,赶紧找个差使逃之夭夭。回来后我对父亲说:“没想到你整天给我讲的这些事,那些大学者还没我讲得明白呢。”从此来了兴趣,整天缠着父亲继续给我说“有”道“无”。

国家界碑是“有”,国民享受的国内空间是“用无”;法律法规是“有”,规内享受的自由是“用无”;条条框框越多,自由空间就越少。

语言文字是“有”,读者想象空间是“用无”;指定太多,想象空间就越小。

所谓文化人,本身条条框框就太多。历史人文、道德规范、宗教信仰,把文化分成东方文化、西方文化;把时间分成过去,现

在、未来;把空间分成上下左右;把生物分成有生命和无生命等等。这些思维定势,把人们的想象力框定在狭小的范围内,思想飞不起来。

用最少框定性的语言,打动读者的心,将读者的思想冲破束缚,带到一个可以展开无限想象的自由空间,天人全息,时空全息,在“灵”的层次上天马行空。他说:“我们的人民,若少一点奴性,多一点灵性,其创造力将会是无限的。”这是我父亲诗探索的终极目标,以此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到此,我才慢慢懂得父亲为何在改诗时一减再减,语言框定的“有”越少,带来“无”的想象空间就越大。正如去掉四面墙的亭子,才能看到最大的视野。我为父亲这种不顾名利、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所感动。

父亲生命的最后阶段是非常孤独的,能陪他探索这些东西的人越来越少,因我常在他身边,只能讲给我这个外行听。我问父亲:“怎么能在短短的几行小诗中融入无限的信息量?”

父亲反复思考后郑重地对我说:“我看问题的观点是站在宇宙层面上,一下子就把非本质的东西忽略了,我只寻寻觅觅拨动读者感情那根弦的那个点。”

父亲把文学艺术分了几个层面:政治层面——宣传工具;文化层面——历史、人文、高雅、通俗、东方、西方等等;宇宙层面——纯粹的生命、美、人、自然、社会都是生命。

例如写《乔戈里冰瀑》:
溯流而上
试试它的力

冻在洪荒中了
摇着尾鳍

虽然诗写的是自然中美妙的冰瀑,那个积极向上生动顽强的是人还是物?今人古人?中国人外国人?用得着分吗?谁读到被震撼了,那个摇着尾鳍的就是谁了!